

史·文·函
學

世界改向的展望

紅色中國的挑戰

· 辰 社 ·

紅色中國的挑戰

紅色中國的挑戰描寫了抗戰中國中一大半人民的覺醒，以及這一大半人民怎麼樣具體地，實際地解決了自治政府的問題。紅色中國的挑戰也描述了中國共產黨鬥爭的目標和成就。新中國的這種重要的政治發展是決定亞洲未來前途的非常重要的因素。也因為這樣，這本書不但是在國際上的重要著作，而且更是我們每一個中國人必須閱讀的重要著作。

628.504
179
(348):1



3 0590 8803 3

世界政局的展望
—— 紅色中國之挑戰 ——

著 史坦因 · 根室
譯 敏 買

· 1946 ·

A071445



目錄

- 一 日本準備着東山再起……………一
- 二 延安·莫斯科·和我們自己……………二

一 日本準備着東山再起

日本的軍閥們好像已經定好了一個計劃讓日本逐漸回到世界強國之列去，然後再來一次征服。這種話聽起來也許覺得玄妙；但是比較前幾代的日本軍閥們所定的建立世界霸權底綱領却並不更來得玄妙：在一八五八年，堀田的綱領中就撮要地說過，必須怎樣利用西方的列強以教育和幫助一個弱小的日本，使她變得充分地強固起來，征服列強手中的世界；到一九二一年，田中奏摺里又有着侵襲珍珠港和其他領域的詳細指南。

日本的領袖們早已明白地認清了，日本在這次戰爭中的敗仗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他們好像不甘自願地承認，這一個將要到來的災禍，就是日本光輝的七十年征服生涯的末日。他們覺得，在這一

戰爭還未結束之前，日本理應就安排好一個下一回合的計劃。

日本的新計劃集中於巧妙地利用中國來作爲日本軍國主義的東山再起。

這個計劃的先決條件是政治的——阻止中國變成一個真正的民主國家，阻止中國獻身於人民所需的和平社會底進步，以及阻止中國與聯合國密切地合作起來穩定世界的和平。因爲這樣的中國對於日本的軍國主義是毫無用處的。

但是日本所需的也不再是一個在弱的分化的中國了。相反的，他們必須想法幫助中國變得強固和統一起來——以一個把國內的力量導向軍事化，把國際的勢力導向擾亂新世界的平衡，把找尋同盟的企圖導向（無力傷害然而在潛力上非常有用的）日本底中國反動政權作爲基礎。

證之於周恩來在延安根據了截獲的文件所告訴我的話，日本人也許早已採取了實施他們計劃的第一個步驟了。他們好像早已準備好，在最後被逼着離開中國的時候，留下一支有力的第五縱隊。

這一支第五縱隊是由中國的傀儡組成的。它是爲日本人的第一個必要條件工作的——加強中國的反動份子。它將盡可能承繼在中國打了敗仗和投了降的日本軍所留下的武器，軍火，和接濟。此外，這一支第五縱隊是用來反對中國的共產黨的。

爲着闡明日本人的目的究竟何在，說一說中國傀儡們的政治性格是必要的。

中國被佔領區中的附逆份子，其成份是特別複雜的。到日本人的權力在中國崩潰的時候，要在無數和日軍共同工作了許多年的中國的政客，商人，地主中間區分出誰是化裝了的愛國份子，誰是無害的良民，誰又是日本人的真正的同盟，這是極端困難的事情。

等到愛國的中國要把他們復員或處罰的時候，在傀儡陣營的兩翼底極端，有許多情形是很清楚地不會引起問題，也不會有什麼爭論的。

化裝了的真正愛國份子不是沒有的，至少在下級的政治傀儡和下級的軍事傀儡中是如此。他們中間有許多已經替國民黨，尤其是替共產黨盡了很大的力，做了很有用的反日工作；他們中間有一些是在從事傀儡生涯的開頭就開始的，又有一些是在看到了日本人的必然潰敗之後也開始了。

相似地，在高級的政治傀儡中，有幾個已經罪惡昭彰，沒有希望僞裝他們自己了，他們中間有幾個甚至已給重慶的國民政府指出來承受審判。在重慶的外國新聞記者會議席上，政府當局發表過各種各樣的言論來回答我們所堅持的問題。但是政府的發言人對於附逆份子終是非常的不願說起。他們拒絕把受審判的著名的傀儡領袖名字宣佈出來。每一次他們都暗示說，在好像叛國的傀儡中間，有許多從前屬於國民黨的高級官員不能一概而論。

有許多軍事的傀儡在替日本工作着，他們不但不攻擊重慶的部隊，甚至還幫助國民黨在日軍後方反對中國的共產黨，主要的問題彷彿也將在那許多情形中發生。

在延安的共產黨領袖以及幾個從各戰區來的八路軍和新四軍的高級人員告訴我們，他們有絕對的證據證明：帶着部隊投向日本去的國民黨將領，實際上是奉的上使之命。在有些情形中，他們告訴我們，投向敵人去的命令實際上發源於重慶的軍事當局。在另外一些情形中，這些命令是由戰區司令或重慶政府軍在前線負責的長官頒發的。據共產黨說，在這些人投降之前，中日雙方對於那些部隊在任新傀儡務中的特殊用途還先行訂好了協定。

共產黨指摘說，在這後面，國民黨是有其一定的政策的——就是所謂「循環救國政策」。據共產黨說，這種政策在許多地區里是被公開地解釋着和宣傳着；舉例來說，在山東就是如此，這也許是由下面的考慮所決定的。

中國的民族救亡不但需要最後擊敗日本——這在西方列強的相助之下是遲早會得成功的；而且也需要打敗在抗日戰鬥中被佔領區建立了有力陣地的中國共產黨。國民政府本身所須對付的也正是共產黨。

看到了共產黨不斷生長的力量，國民黨就認為必須使用——甚至在對日戰爭還在繼續着的時候——某些國民政府的部隊攻擊他們，以保持高於一切的民族救亡的利益。這樣的行動對於國民政府在「自由中國」或在國外的威信是沒有損害的，因為從敵後漏出來的新聞很少，而延安邊區本身又被堅固地封鎖着，與外界不通聲息。

適合於這種任務的第一類國民政府部隊，就是那些留置在敵後的。因為由於他們和自由中國的隔離，又由於他們不能如共產黨那樣地把他們佔領區內的人民的戰力組織起來，他們那種抗敵的用途是被破壞了。然而那些部隊的不能得到人民的助力也使他們在反對共產黨的戰爭中變得多多少少地無能起來了。

日本當局是願意把他們接收過來的，而且答應他們讓原有的司令官統率他們。日本當局願意接濟他們，重新配備他們，重新訓練他們，指導他們——唯一的目的是爲了要使他們繼續反共的戰爭；關於這，日本人至少一直是和國民黨一樣敏感的。

日本當局把類乎此的條件明明地提給了處於前途絕境以及抗日的戰鬥力被供應的困難和拙劣的領導減削了的國民政府的軍隊。

在延安看來這就是四十五萬左右的政府軍怎樣幫助日本人和國民黨反共的事實；這些部隊是原來的那個，司令官和重要長官也是原封未動而且由日本人的相助加強了；他們不但與日本人有著連絡和合作，而且和戰線另一邊的國民政府的主要軍隊，甚至是和重慶政府本身也有連絡和合作。

這自然不可能證明國民政府的將領們究竟奉了誰的命令，根據了什麼理由帶着他們的部隊投向了日本，又究竟爲了什麼，他們在日本人的指揮之下打着共產黨；或者，在戰爭過程中投向日本去的政府部隊究有多少變成了日本人的傀儡。但是重慶政府的發言人幾次地承認了，某些著名的將領和他們

的部隊是被日本人「俘虜」去的，那些將領中有幾個常從日本的佔領地區向重慶廣播，彷彿他們已在傀儡陣營里居了要職，雖然「恐怕是被要挾的」；還有「一些」從前的政府部隊現在正在當着日本人的傀儡。

我至少知道有二次，重慶的軍事長官坦白地向協約國的人員承認，他們和各地政府血統的傀儡軍都有連絡和合作。這也是事屬有據的，因為那些部隊每天都在打着共產黨；但是從重慶的戰報上看起來，除了當地徵用的一些便衣人員外，傀儡軍彷彿很少被用來攻擊國民政府的軍隊的。

這就是爲什麼延安要非常強烈地懷疑重慶對於「叛國大罪」的觀念。延安認爲在日本被打敗的時候，重慶的那種觀念是不夠廣得去審判和處罰很多偽軍的軍官的。這些軍官也許會公開地被復員，甚至被褒獎，甚至被併入國軍；然後再被用作反共。

原來重慶所稱的「循環救國政策」是要在日軍最後被逼離開中國的時候，一定要使忠於國民黨的部隊就會在敵後共產黨控制地區的四周出現。

那些長官和部隊在民族敵人敗退的時候，是會在那里的。看起來，他們還將是一股很大的力量。他們被認爲營養比較好，訓練比較好，而且在現在早已比一般重慶的軍隊得到了更好的配備。此外，他們都被強烈地養成了一種反共和排外的意識。我在延安所看到的那些從日本軍隊那里截獲的宣傳資料，清楚地指出了敵人對於他的傀儡，特別着重以反動的國民黨意識爲基礎的反共和排外的教育。對

於蔣介石將軍的指摘是避免的，或者僅限止於批評他那『使重慶倚賴了亞洲人民的西方敵人』的政策。根據周恩來提到的那些截獲得來的文件說，這些傀儡軍隊是要在日本的軍事力量遭逢到災難時承繼日本人遺下的武器，軍火和供應。他們要以這些傀儡，在戰後的中國建立他們的第五縱隊。

如果日本人的計謀得逞，他們必會得到什麼呢？在什麼『循環』之下那些部隊能夠用來推進日本的——『民族救亡』呢？

第一，如果日本人慷慨地把作戰的物資接濟了他們，那末那可以使中國的內戰更加可能爆發。國民政府中的那些渴望儘快肅清共黨的反動份子底地位就會被傀儡中的反共健將大大加強。日本人的武器，軍火，以及供應品的繼承權利將使那些傀儡的將領在對抗國民政府政治或軍事會議中底『延安綏靖者』的時候，得到一個優越的討價還價的地位。他們甚至會以發動大規模的反共攻勢造成既成事實，然後使國民黨的正規部隊支持他們。

第二，由於共產黨力量的強大，內戰必然會很艱苦，很長期的。這一種內戰將自然而然地取消蔣委員長曾經答應了中國和協約國的：把國民黨政權開放。國民黨將加強和保全它那反動的特徵，而且使它具有一種更強烈的黷武色彩。

第三，爲了世界的和平，協約國也許會逼使重慶停止內戰，而這種行動是必然會受到國民黨的右翼反對的。協約國的壓力（即使還不致阻止接濟品流入國民黨的中國），更會加強右翼的國民黨陣營

中的反蘇偏見，和普遍的排外傾向。這也許會替日本企圖東山再起的第二個先決條件砌好一條道路：反動的中國政權愈來愈厭恨西方的列強而且愈來愈想反對他們了。

在協約國企圖阻止中國的內戰和栽培中國民主政治的同時，日本却想在國民黨中孕育排外的感情。這線索，如果拿一九四五年二月四日同盟社廣播的東京日本泰晤士報上的那篇文章來說，是非常清楚的。

「美國企圖逼使重慶和延安合作的努力，」這篇社論說，「由於這二個政權所具有的根本不能相容的性格，將對重慶非常的不利。這二者的利益是不可能合而為一的，因為蔣介石的權力依賴着銀行利益的財力，大地主，一般的布爾喬亞以及官僚政客的支持——而延安的權力却基礎在革命的農業運動中生長的，過激的理想家庭無產階級的獨裁政治上面。」

「蔣介石悲哀了，因為他認識得很清楚，如果他依照美國的願望而與延安妥協，那無異允許了延安的戰馬躍進重慶的城垣。」

「如果（美國的壓力）最後終於使延安公然反抗了重慶，那末那也就是說，美國將來企圖在華中的經濟深入和剝削就可以受到更少的中國的民族主義的抗拒了。因為那終究是美國在華陰謀以及反抗日本——阻撓美帝國主義的亞洲選手——底最終目的。」

換句話說，日本以為祇有以內戰的手段打敗了共產主義才能使中國強得足以抵抗美國「帝國主義

的陰謀」。在重慶的某些反動的國民黨中間，這種觀點早已存在了。

在被佔領地區的某些日人似乎早已發展了一串進一步的論點。他們主張在戰後日本的軍閥殘餘和中國的反動份子之間取得一種諒解。他們竭力想以「亞洲的反美帝國主義者底先鋒」來解脫日本對待中國的罪咎；他們竭力想以日本資本主義和官僚政治的腐敗解釋日本的暫時失敗。他們說，這種腐敗政治的存在破壞了日本亞細亞理想主義的性格。失敗將使那種理想主義純粹起來。

中國因此再沒有什麼東西害怕日本的了。相反的，她必須和日本真正地合作起來反抗西方的共同敵人——他們使中國爲他們流了血，而且剝奪了中國戰勝了日本底果實。

就是以這種方式，日本人要想達到她那謀略的下一個階段——依照一九二一年訂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二個敵人之間的協定而訂立一個中日的「拉帕羅條約」。那就是說，勝利的，但是被內戰枯竭了的俄國，像中國一樣，雖然擁有廣大的人力和未被開發的自然富源，却無技術去加以利用；而戰敗了的德國呢，沒有這樣的財富，但有工業和軍事的技術去幫助俄國克服她的困難。

日本軍閥對於中日在戰後相互武裝的願望，在周恩來將軍告訴我的文件中間就有形蹟可尋了。

日本人好像祇要求一個交換條件就可以把武器，軍火，和給養留給「可靠的」僞軍了：那條件就是把某些日本的財產，機器，和技術專家安全地隱藏在中國……

我們必須估計到中國和日本之間某種合作形式的可能性。至於說到二個民族之間的仇恨，那末，雖然經過了許多年的衝突和戰爭，比起我們和日本或是我們和德國之間的仇恨來也許是較不長久的。

作爲一個民族來說，日本人之恨中國人民似乎並不像他們恨我們一樣。他們因此也許會把最後失敗的理由不歸諸於中國而歸諸於我們。另一方面，中國好像比英美有更多的人不害怕和戰後日本的一二集團合作，他們甚至還想把這種合作加以發展。在經濟上說，這二個鄰國有好些方面是相互補足的，而且還有機會在比戰前更大的規模之上互相從事有利的貿易。從文化上說，在他們兩者之間比較他們和任何西方的列強之間有着更多的相同之處。在這二個國家的反動份子循着非常相像的路線思想的。在日本的自由主義份子獲得了更多的智慧和政治上的自由底時候，中日雙方的進步份子也許更是如此。在政治上說，那末這二個國家在戰後世界里的發展是相互依賴的。

如果單爲了這二者之間的地理上和文化上的接近，那末一個真正民主的中國比任何一個西方國家更能培養日本的真正民主。否則，一個反動的中國將使日本軍閥主義的根深蒂固的意識和組織更難——不管對我們自己和對日本的進步份子都是一樣——迅速地，澈底地毀滅。

反轉來也是一樣的正確。一個肅清了的日本，安全地步向民主改革的日本將會奪去中國反動份子可以在亞洲找到的唯一有力的幫手，然後在這樣地削弱了中國的反動派之後，就可以在她自己的民主進展中幫助中國了。

但是一個不完全民主的日本，一個受協約國的阻撓，而把人民反君主，反商賈，以及反地主主義

的發展壓制了下去的日本一定會加強中國的反動份子——與日本的反動派有着一種悠久的接觸和同情的中國反動份子。

中國和日本在政治制度上的相互影響，對於戰後亞洲的發展是有深遠的後果的。協約國必須將這個考慮來決定未來的對華對日的政策。

一一 延安·莫斯科·和我們自己

亞洲俄國的領土魁梧地聳立在中國東北幾千英里的遼闊的邊疆上。也因爲如此，在那些邊疆的長城之間的中國底邊省都有着一種俄國影響的歷史。

在東部的滿洲——廣袤，豐盛，人煙稠密，直至日本驅走了俄羅斯人，先而變成了這地方的索取者，繼而又變成了這地方的佔領者之後，才脫離了沙皇的統治——將再一次地見到俄國的部隊踏在它的土地上，如果俄國加入了反日的戰爭。

在中部的外蒙古——一塊廣大的領土，由蒙古的遊牧民族散居着，從未被他們所恨的中國軍閥有效地統治過——在俄國的內戰時期變成了一個自治共和國，然後又變成了蘇俄反日的同盟和緩衝。

在西部的新疆——高大而乾燥，居住着少數外來的回民——近年來愈加和中國疏遠，而和俄國親近，而且直到二三年前，還在俄國的影響之下。

在心臟部的華中和華北，有廣大的地域是在延安的共產黨手下；此邊鄰近俄國控制的外蒙古，東邊直達俄國軍隊起來打擊日本的地方。

這一幅明細的中俄政治地圖——正確而易被誤解——常被利用來使人相信下面的指摘：莫斯科出兵統治中國，而且在物質和道義上支持延安了。俄國干涉了中國的內政。中國的共產黨是他們的附庸，準備把莫斯科所要併吞的任何領土交給他們的俄國同志。反蘇和反中共的世界民主戰線是拯救亞洲和世界赤化的唯一辦法。

在中國和俄國的共產黨之間是些什麼關係呢？

有好幾次，重慶政府的負責官吏們告訴我，他們對於蘇俄給於中共的物質接濟從未得到過什麼證據，甚至從未有過鄭重的懷疑；據他們所知道，在延安和莫斯科之間是沒有什麼關係存在的，有的話，可能祇有無線電上的接觸而已。

在莫斯科和延安控制的領土之間，陸上交通好像真的是不可能的。一個遼闊的沒有路的，半沙漠的地帶——深達幾百至千哩左右——把俄國控制的外蒙古和作着延安抗日根據地和邊區屏障的內蒙古分了開來。

那一個地帶被嚴格地保衛着；在西邊有中國國民政府的軍隊；在東邊有日本軍。二邊的軍隊據說都有飛機偵察器的配備，以便偵知飛往中共地區去的任何蘇聯飛機。而且二邊都好像不會把他們的發現保守秘密。

蘇聯在過去，很明顯地最不想激怒重慶的國民黨政府或是日本。那事情本身可能使延安的人們 positively 不認在俄國領土和延安地區之間存在着任何勾結。

中蘇的外交和軍事的接觸也彷彿祇存在於重慶與莫斯科之間。俄國有二個塔斯社的記者和一個軍醫在延安，他們是在好幾年之前拿了重慶的護照，從蘇聯搭飛機，經國民黨所統治的中國而到了那裏的，那三個人好像是延安地區內僅有的蘇維埃公民。

我所能發覺的一切關於無線電的接觸便是：莫斯科的消息在延安被收聽着，並且還由塔斯社的代表發到各報館，各政府辦公廳去，和美國戰時情報局國外分局。以及英國情報部在中國和任何其他的地方分發他們國內的廣播消息非常相像。

但是莫斯科對重慶的態度怎麼樣呢？

在中日戰爭的第一年（那一年對中國是最危險了），中國從俄國那裏得到的軍事接濟較之英美要大得多；當重慶的圍條們指摘英美因為恐懼日本而不能更多地資助中國，又不能革除日本戰爭所需的英美輸出品時，他們終是那末告訴我的。

爲了蔣介石的請求，俄國人不但把一大羣飛機駕駛員，而且也把一大羣軍事顧問派到了國民黨的軍隊里——帶領這些駕駛員和軍事顧問的一位將軍，日後在史大林格勒城的戰爭中，證明了他是俄國最能幹的戰略家之一。他們中間有一部份一直在重慶待到俄國被德國攻擊之後，但是沒有一個俄國的軍事顧問曾經被指摘爲和中國共產黨有關係的。

當統一戰線在中國低落的時候，中蘇關係變得比較冷淡起來了，它增加了莫斯科和重慶之間的相互猜疑。

爲了這個背景，在新疆問題上的細小磨擦引起了二方面很大的憤懣。

一種特殊的情形，一如中國邊境區內的舊式政治真空，在那一片遼闊的半沙漠的省份——陸空連接了中蘇二國，然而從未在國民政府有效統治下的省份——裏發展了起來。

這地方的軍閥統治者是一個滿洲將軍，他利用了新疆各種族團體間的私爭，而在一九三〇年的早期造就了他在省內的統治地位；他是執拗地反對重慶政府的——像一直反對外族中國人統治的當地人民一樣。他請求，而且接到，俄國的幫助來作爲他自己領域內的經濟發展。和附近蘇聯的貿易興旺起來了，一向是默默無聲的省份達到了新的成功。

重慶反對新疆的蘇聯勢力和蘇聯駐軍，這些軍隊的滲臨顯然是爲了由部落騷動所引起的普遍不安。在重慶和莫斯科的關係冷卻下來的時候，關係俄國領土野心底謠言愈來愈堅持了。

當新疆的軍閥相信蘇聯差不多已被德國擊取時，這局面終於來了個收場，新疆和莫斯科斷絕了關

係而和重慶講了和。

俄國人很顯然地不企圖反對重慶在那邊樹立統治。一切的俄國經濟顧問，技術專家，警務人員，還有充其量也不超過一二團的蘇聯部隊，在蔣介石將軍的請求之下撤退了。但是相互間的猜忌已經太深，已經不能使言過其辭的新疆問題獲得解決而成為改進中蘇關係的基礎了。

重慶和莫斯科之間，從未因國共的衝突而有過什麼公開的磨擦。事實上，莫斯科外交對於這樣的爭端彷彿比華盛頓還要緘默得多，雖然，蘇聯爲着希望有一個強盛的中國，在她對付日本底一翼，對於中國的民族團結也如美國一樣關切垂注的。

甚至在和重慶領袖們，以及中外外交家們底談話中，我從未聽到過蘇聯也會像美國國務院那樣愈來愈堅持地，正式提出過國共問題。

但是這在莫斯科和重慶之間，也許會很容易地發展成爲一種尖銳的爭端——甚至比蔣介石將軍方面的協約國參謀總長，而且最主張國共修好的史蒂威爾將軍撤職底危險期間，存在於華盛頓和重慶間的爭端還要尖銳。

如果蘇聯參加了反日戰爭，莫斯科會逼使重慶允許和中國共產黨在敵後的強大的軍事力量合作，比華盛頓還要逼得厲害，比華盛頓更不準備因失敗而告退。

在戰後遠東問題的解決上，——不管莫斯科以何種方式才可以對打退日本有所貢獻——莫斯科會

提出它那熟悉的要求，在鄰近的國家內建立友善的民主的政權；至少，把圍繞於國共衝突四周的疑難問題提將出來。

華盛頓彷彿早已知道了那些前途。國務院在一九四三到一九四四年間底竭力使共產黨的武力參預反日的協約陣線，以及用國民政府的民主化來幫助國共二黨間的諒解，顯然地有三個理由。

第一，爲着復活中國的戰力和加強美國的戰略。

第二，爲着要在俄國加入太平洋戰爭的情形中阻止莫斯科和重慶間的尖銳危機底爆發，因爲那樣就會形成反日戰線方面的俄國和中共軍隊間的連絡或甚至是合作。

第三，爲着替具體的遠東和平方案鋪砌一條道路，不使中國的二個政治和軍事陣營間的鬥爭發展成爲較巨哥斯拉夫，希臘和波蘭所發生的更要危險的一組國際問題。中國真的也許會變成第二個西班牙。

這就是爲什麼前任副總統華萊士在去年訪華，他和國務院都竭力想在重慶栽培中蘇間的較好的關係；這也就是爲什麼，羅斯福總統個人對於未來發生了很大的興趣。

中國共產黨並不否認他們希望着中蘇間有更好，更緊密的關係。他們公開地批評着國民政府底對蘇態度。共產黨說，重慶政府對於蘇維埃主義底意識上的厭惡使重慶盲目地判斷了蘇聯的目的和地

位。它使中國的外交政策有了強烈的反蘇偏見，而且促成了中蘇關係的每況愈下，這種情形祇會不利於中國，不利於世界的和平而已。

延安的領袖們是非常現實，而對於中美和中英的合作又是非常敏感的；因此，他們並不要求中國採取一個單獨依靠蘇聯，或甚至是主要依賴蘇聯的政策。

『中國不能祇和一個列強或者一羣列強發生友善的關係』，毛澤東對我說：『這是一樣的錯誤，如果中國祇依賴蘇聯而冷淡英美。近幾年來的重慶就是如此，它祇依賴着美國，而對蘇聯表示着仇視，懷疑，以及真正的不友好態度。』

『要想依賴資本主義國家以及蘇聯之間的衝突底惡化而從中取利，是非常危險的。在重慶的國民政府就想如此，這是同等地違反了中國自己的利益和世界的利益。』

『我從不相信資本主義國家和蘇聯之間的衝突是無法倖免的，相反的，我們中國共產黨——我們正在完成新的民主政治而使我們地區的一切社會階層密切地合作起來——深信資本主義的世界和蘇聯雖然也有困難，是能夠而且也會學得像在戰時一樣，在和平時期中緊密地合作。我們必須不對那種否認穩定的世界和平底可能性底失敗主義者底態度讓步，因為這種態度的本身，到最後終於會妨礙了朝向真正和平底進步。』

中國能夠而且必須成爲二個陣營間的橋樑之一，而不能以磨擦地帶之一的地位來贏取國外的支持。

『中國的進步依靠着真正的世界和平，我們國家的國際任務要提高，祇有真誠地和一切國家合作，幫助一切國家克服它們的困難。』

共產黨並不是強烈批評右翼國民黨底對蘇態度的唯一的中國人民。實際上，比右翼的國民黨領袖們有着更廣博的世界問題底知識的許多自由派人士——幾年來已經發表了同樣的意見。

在這些自由派人士中間，有一個著名的就是孫科博士，國民黨領袖孫逸仙博士的兒子，自身又是國民黨和政府中的一個高級人員。他不能說是中國共黨的『同情者』，而是一直主張着俄國對於重慶的態度並不是由中國共產黨的堅強的陣營底存在所決定的，重慶的不對蘇聯採取更友好的態度對其自身祇有損害而已，蘇聯一直表示着隨時都願意改善對中國的關係，隨時都願意幫助蔣介石政府。

在共產黨所領導的軍隊中間，而且在共產黨黨內，民族主義是非常強烈，非常真摯的。這而且還是整個政治制度的基礎。在這種政治制度下，延安才能在它的戰區內獲得人民的合作；因此，這將是笑話的，如果我們問共產黨，他們是不是願意幫助蘇聯併吞中國的土地。

但是我問毛澤東，外蒙古雖然已經脫離了中國四十多年，而由一個她自己的革命政府與蘇聯合力治理着，但她名義上始終還在中國的宗主權下，他對外蒙古問題有什麼意見，他要外蒙古歸返中國嗎？

『我們的國民政府必須首先認清外蒙是一個自治的民族國家，』他說：『依照孫逸仙博士給與一切少數民族——外蒙古和西藏都包括在內——底諾言。蒙古人不是中國人；他們是一個屬於他們自己』

的民族。

『當他們以自己固有的權利建立了他們自己的民主共和國的時候，外蒙古發表了一個宣言，這宣言說，他們是會歸返中國的，祇要他們被承認了是民族的本體之一，而且依照了孫逸仙博士的諾言，在中華民國之下享受了同等的自治權利。』

我希望而且沒有懷疑，他們是會歸返中國的，祇要國民政府實踐了中華民國和國民黨的創立者底諾言。

就是國民黨內的穩健份子也不渴望強迫外蒙古重新恢復對於中國的舊的關係，他們好像並不把直接的重要性歸諸於這個地區的宗主權，因為這個地區從未置於中國的有效統治之下，而在事實上，依據孫逸仙博士為國民黨的基本政策所定下的主張，却有着一種理論上的自治權利。

中國的國內改革以及中蘇關係的一種改善可以沒有困難地解決問題，他們相信，特別是在日本打敗了的時候；因為在外蒙古與日本的長期衝突過程中，外蒙古的戰略重要性就是為什麼蘇聯在那個領土上獲得了這樣一種強烈影響的真正理由。

『讓我們現實一些？如果中國在一九三七年統治着外蒙古的話，她有什麼好處呢？』有一次，重慶的一個自由派人物對我說。『日本人會毫不費力地佔領了它。他們會威脅了西伯利亞的心臟深處。這也許早在有利於侵略者底情況之下變更了世界政局的路向。』

但是延安對於世界大事的態度是和莫斯科的獨立無關的嗎？中國的共產黨不是在一九三九跟隨着共產黨國際的路線，而把歐洲戰爭斥之爲「帝國主義的戰爭」嗎？」他們不是像其他的共產黨派一樣，在俄國受到了德國的攻擊時變了樣嗎？

我向博古挑戰。他是延安解放日報的編輯，共產黨政治局的委員，在延安的世界政局會議中，他是和主要的「外交家」周恩來將軍同等重要的。

『我們不喜歡再講起那一章近代史了，』他說。『因爲那得說到那時候的英國對華政策，不過我們既已成了盟友，那是能夠加以忘記的。但如果你對此有興趣的話，我必須把我們的觀點提供給你。』

『從一九三七年的抗日戰爭開始，我們『便有聯合一切民主國家，特別是英美』的口號。我們是強烈地反對德國和意大利的——比重慶要強烈得多——因爲這二個國家早已成了日本摯友。我們祇要民主國家給中國支持。但是發展却使我們失望。』

『祇是重新提一提幾個象徵的細節：日本人故意用飛機襲擊了英國駐華大使許閣遜爵士的汽車也沒有引起倫敦對日採取強硬的立場。在漢口失陷之後，英國大使館沒有移到中國的戰士首都重慶，而是移到了部份已給日本佔領的上海。』

『最不幸的，英國首相張伯倫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的下議院裏發表了那樣的一篇驚人的，共同議定的宣言，這篇宣言實際把中國放棄給了日本，他說即使日本征服了我們中國，他對於英國在華的貿易前途還是樂觀的，他的理由是：日本需要英國資本的合作來開發中國。』

我在一本舊的密勒評論週報裏查到了關於張伯倫一九三八年十一月裏在下議院發表演說的報告。這個報告說：「他宣稱，他對於英國在華貿易的前途是樂觀的。他說，沒有大量的資本，中國便不能開發，『爲了那（資本）日本一定得求助於其他國家，包括英國在內。』他又說，無論誰要重建中國，沒有英國的某些幫助就無法成功。」

「到最後，」博古繼續說：「英國終於在日本的壓力之下不必要地封鎖了甸緬路。英國又把中國的白銀放棄給了日本。倫敦的『泰晤士報』繼續以最坦白的緩靖政策對付日本。那時真有東方莫尼黑的危險。而法國政府的對華態度，無論是在上海的法租界內，或是在法屬印度支那，甚至還要惡化。」

「我現在不是在譴責英國和法國，我祇是要你知道影響我們對於歐戰的態度的不是別的，而正是我們對於英法政策的一般估計。我們從來沒有說過德國是對的。我們所說的一切便是：英國和法國政府的政策基本上還是由帝國主義的考慮決定的。」

「但是英國在遠東不是沒有力量採取對日的強硬路線嗎？」我問。

「我承認我們在那時候不知道英國是那樣地弱。他的軟弱到後來才使我們喫驚。但是要點是：英國的一切弱點大致都由於她那錯誤的帝國主義政策產生的。而張伯倫的對華態度更是由他那種政策的一般特性所決定，而不是由英國的軍事弱點所決定的。」

「現在，我們再來說我們發表那個意見的時機吧。毛澤東同志是共產黨領袖中的第一個把戰爭斥爲帝國主義的底人。他在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接見了一次新聞記者，如果他是依照着共產國際的命令

着的話，那末爲什麼不把那個命令先給一開頭就支持戰爭的英國共產黨的飽立脫，或是給與戰爭更有關係的法國或美國的共產黨呢？」

「但是，一九四一年德國的進攻蘇聯怎麼改變了英德戰爭的性質呢？」

「邱吉爾先生立刻斥責了英國對於蘇聯的仇視。那意思也就是說，斷然地把張伯倫的帝國主義政策顛了過來——對於中國也是如此。」

「事實上，我們已經早在一九四一年的五月裏開始改變了我們的態度了。是的，當然沒有共產國際的命令。解放日報那時說，東方莫尼黑的危險是不再有了。」

「邱吉爾的新政策是對人類有利的一種進步政策。所以我們是能夠給予支持的。這種政策改變了戰爭的整個性格，不惟影響着歐洲，而且也影響着整個世界。」

我懷疑，如果以中國共產黨的現在的觀點看起來，延安當初把歐洲戰爭斥爲帝國主義的戰爭是不是一種錯誤的步驟：說它錯誤，那因爲這好像祇被當作一種認識上的宣傳，而沒有被當作一種實踐的政治。

博古祇是笑了。

共產國際已經從那個時候起解散了。

但這在將來也許仍舊會得發生，那就是，中國共產黨對於重要的國際形勢底反應將和其他國家內

的其他共產黨底反應一樣。

在有些人看起來，這也許因而會證明，莫斯科有另外一種組織代替了共產國際，以使全世界的共產黨底態度一致。那也許是如此，也許並不是如此；但是依我在延安和莫斯科的經驗說起來，我很覺得中國和俄國共產黨的共通的政治哲學，就是他們對於世界大事有着相似的反應的充分說明。

但是，如果有一天，中國的共產黨也許會在中國的民族利益不同於其他國家的利益底爭端上，採取了和別的共產黨不相同的立場，甚至很可能是不同於俄國的立場——那時我也不會覺得驚奇。

那證實了我對於中國共產黨人怎樣判斷國際形勢的印象，那就是；他們分析世界政局的方法是馬克思主義的，然而他們的觀念是由中國的民族需要所決定的。

我不敢相信，任何一個我所結識的中國共產黨，會認為他的黨和他的黨所控制的地區，是壓根兒地從屬於莫斯科的，或者在他想起來，這竟是由屬於他自己的國家之外的國家底利益所驚駭的。

中國的共產黨是民族主義者。在今日比較以前（就說五年以前吧）更是。他們這一種民族主義的不斷擴大，彷彿是由於共產國際——它的影響恐怕遠非一般人相信的那末大——的衰亡，而主要地是由於延安在一九四一年所介紹的新民主主義。

那一種新的政治制度，看起來彷彿使共產黨的頭腦大大地民主化了。這使他們不再以共產黨的老的「階級」來思想，而以中國民族的整體來思想了。

在重慶的英美友人們要我在延安找尋回答的問題中，有一個是：如果中國共產黨對於國民政府，

獲得了決定性的優勢，或者，如果共產黨控制的中國變成了另外一個整體，那末中國共產黨以及他們對於外交政策的觀點怎樣適應於戰後的世界呢？

我發覺，延安對於外交政策的觀念和國民政府所公佈的外交政策，在主張上是沒有什麼不同的。甚至是中蘇友誼也是重慶的外交政策誓必實行的目的之一。

這些便是我在延安聽到的，一般對於重慶的外交政策加以批評底主要點。它們刻劃了延安對於國際政局的展望。

第一，重慶的外交政策基本上缺乏民主政府的必要基礎，因此也缺乏了正確的國內政策——因為『外交政策開始於國內』。

第二，蔣介石將軍的個人干涉——還有國民黨內某些反動份子通過了他而發生的干涉——結果終於會干涉了負責外交部的，對於世界大事有着更多的自由派傾向以及更廣博知識的人士底外交。

第三，在重慶所公佈的外交政策底理論，以及由那些因素形成的真正的外交實踐之間，是不相符合的。

共產黨人似乎比國民黨內的死硬派人士和集團有着更強烈的信心，他們認為國際發展的邏輯應該使世界的民主政治在這個戰爭得勝之後，戰勝列強的均勢政治。贏取和平的失敗主義在他們看來是和贏取戰爭的失敗主義一樣可詛的，在毛澤東告訴我的話中，就含有這樣的意思。

他們並不像國民黨領袖那樣恐懼，由於中國在軍事上的弱點，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主要地依靠着她的是否能完成民族的團結和民主——而不是依靠着她的軍事力量，她的國際威信以及她能隨時在外國發揮的勢力。

重慶在國內政策中的失敗——在戰力方面，也在政治，經濟，以及社會的改革方面——造成了在戰時外交政策方面的失敗，特別是造成了重慶領袖們恨之入骨的，中國在協約國會議中的徒有其名的地位。

因此，共產黨認為中國必須利用三強讓他們共同的人民發展而為現代公民底機會中，與三強競爭——在真正的民族團結和民主的基礎上——而變成名符其實的第四強國。

共產黨認為中國和蘇聯的關係，是唯一受到重慶外交政策的理論與實踐的不相一致，蔣委員長個人以及委員長幕後人物干涉合理地執行他的所定政策底結果。

中國和英美的關係也同樣地受到了不良的影響。重慶偏面地誤解了國際合作的主張，拿美國來說，尤其如此。共產黨說，國民黨認為除了繼續作戰到底的決心之外，他就沒有別的可以供給協約國了——甚至連協約國希望委員長在幾年前就實行的，迫切需要的國內改革，至少對中國，對協約國一樣有利的改革也不可能提供。

國民黨也同樣認為，協約國的「希特勒第一戰略」使華盛頓有一種義務報答重慶——不維是以一切可能的直接的軍事幫助，而且也應順從一般中國人的那種叫囂而又合作的態度，這種態度是故意

想利用華盛頓討好和安慰重慶的企圖的。

這種「不民主」的中國對美態度（而且在某種程度上說起來，也是對英態度），使得延安恐懼中國在這二個國家之間失去了很多親善的基金——如果這不是失去，一般尚未明白知道真相的民衆的話，那末至少是失去了置身於許多不愉快的爭端中底英國官吏。

毛澤東把他的觀點綜合如下：

「中國在目前的國際地位是十分好的。但是我們必須學習主要地依靠我們自己的力量。如果我們祇依靠一種有利的國際形勢，那我們將永遠不能解決任何一個中國的問題。」

「協約國所公佈的綱領底目標，像大西洋憲章，以及莫斯科，開羅和德黑蘭會議的決定，正是我們在努力的目標。」

「在這次反法西斯戰爭後必要的新的國際關係，須有一個建立在民主基礎上的新的國際聯盟。」

「但是，爲着要使其成功，爲着要完成世界的和平，我們必須在每一個國家內部建立民主政治，而且也須在一切的國家之間建立民主關係。我們希望外國對於中國採取一種民主的態度。但是我們自己也必須對他們採取一種民主的態度，一種互助的——以我們自己的利益爲主的態度。」

作者小傳

根寧·史坦因 (Gunter Stein) 是美國的名記者，他在亞洲從事記者生涯凡十二年。他是英國曼徹斯特導報，倫敦新聞記者報和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的特約記者。在一九四四年的夏秋，他與重慶所特准的第一批新聞記者考察團到了中國共產黨的首都延安。他在那邊待了整整的五個月，他對於中國共產黨在新中國中的驚人發展底報道和分析是最完善，最客觀，最權威，也是最入性的。

世界政局的展望

——紅色中國之挑戰之一九——

著 因坦史·G
譯 敏 賈

社 晨 者 版 出
局 書 大 各 售 經

· 版 一 第 海 上 月 七 年 六 四 九 一 ·
有 所 權 版

72

1946

28.504

79



3497.9